

西夏书法研究三题

赵生泉

摘要：缺乏足够的“年代”意识，是当前西夏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。通过文献学手段，对碑刻、墨迹、钱币等书法“作品”进行科学整理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点。借助“文本”和“图像学”方法解析这些说法“作品”，则可以发掘其文化与艺术内涵。

关键词：西夏书法；年代意识；文献学；文本；图像学

作为一个有实际政权依托的现代学术概念，“西夏学”无疑有广义、狭义两个维度。前者指与“西夏”有关联的一切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，后者专指西夏一代的历史、文化及相关问题。西夏书法，便是其中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。

一、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

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（982年）五月，自祖先在晚唐黄巢之变时即盘踞夏州（今陕西靖边白城子）的党项拓跋部首领世袭静难军节度使，李继捧在内外压力下献土入朝，而其族弟继迁却寻机出逃，于雍熙二年（985年）诱杀夏州巡检曹光实，占据银州，并攻破会州（今甘肃靖远），与宋王朝正式决裂。到宋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年），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正式建立了西夏王朝。此后，西夏先与宋、辽鼎立，后与金、宋并峙，直到成吉思汗二十二年（1227年）方为蒙古所灭，享国凡190年。如果从李继迁叛宋算起，则有245年^①。在这200余年中，西夏不仅武力强盛，先与宋、辽对峙，后与金、宋并立，而且创制了“番文”即西夏文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。但是，蒙古灭夏之战及后续破坏极其酷烈，导致西夏文化、艺术的真实面貌在后世长期湮没不彰。直到清末黑水城遗址（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约25公里处）中丰富的文物、文献被发现以后，包括书法在内的西夏历史、文化、艺术、语言等，才逐渐被纳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中来。就此

基金项目：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《西夏书法史研究》（15BF063）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：赵生泉（1971—），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，主要从事出土文字资料艺术史研究。

^①[俄]E.H.克恰诺夫著，韩潇锐译：《俄藏第8203号西夏文书考释》，《西夏学》第五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8页。



而言，西夏书法研究是“西夏学”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，苏联学者孟列夫在整理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时，就注意到了“书写”问题，并指出《吕观文进庄子义》（俄 TK6）卷三末尾有“显然是用尖木笔写的一些不清楚的字”^①。当然，对他这样的域外学者来说，这只是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，而对中国学者来说，西夏书法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，更何况这一选题还涉及“西夏文”等异质文字呢。1986 年，卢桐发表了国内外首篇讨论西夏文书法的专题论文《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》。由于他具有较好的汉文书法基础，该文大量使用了夏、汉比较法，指出：西夏文字本身（楷书）具有笔画匀称、结字繁复的特点，在结构和用笔上十分讲究，具有汉文楷书“详而静”的特点；方正均匀之外，西夏文“捺”笔较重，笔画繁而不乱，点画穿插有序，至细微处仍见匠心，结体自然，是典型的方块字；用笔上藏露兼施、方圆并出，既显骨力又具精神。此外，该文还讨论了西夏文篆书（包括玺印篆书）、行书、草书的特点^②。至于西夏文书法与汉字书法的不同点，则被归结为“好恶殊方”。1987 年，卢桐又写了《谈西夏文书法与创作》，并入选宁夏社会科学院建院 10 周年论文专刊。该文主要结合实际书写经验进行，并以他亲自创作的西夏文诸体书作为“案例”，学术意味有限。2001 年，卢桐又发表《论西夏文及其书法艺术》^③，但基本是以前研究的重复。

2001 年，韩小忙、李彤根据西夏王陵残碑，由考古角度切入，把西夏文字文物分为早、晚两个时期：早期西夏文楷书一般笔画粗壮，比较生硬，而且笔画之间的搭配相对生疏，如同小学生写的汉字一样，虽然笔画写对了，但是，整个字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十分秀美。如西夏陵区 3 号陵东碑亭所出 T3001、T3003、T3006 + T2011、T3011 等残碑块上的西夏文字，明显给人以幼稚、纯朴的感觉。晚期西夏文楷书的笔画明显趋于匀称，比较柔和，笔画之间的搭配已经相当协调，如同娴熟的书法家所写的字一样，整个字甚至整块碑文给人的感觉是舒服、流畅。如西夏陵区 7 号陵西碑亭所出 M2x: 37 + 58 + 152、M2x: 23 + 250 + 330 + 523 + 555 + 723 等残碑块上的西夏文字，已经明显趋于成熟，不但单个笔画、单个字可以单独用于临帖，就是整块残碑文字从布局到搭配都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准^④。不过，他们作为依据的 L3、L7，一应属元昊，一确属仁孝，彼此相去百余年，置于西夏 200 余年的历史中，中间的跨度不免太大了。换句话说，该文所谓早、晚两期的界限，尚待细化和充实。

以上研究的着眼点都是西夏文书法，但是，鉴于西夏王陵有一些汉文残碑，二者的关系不可能不被考虑。卢桐认为西夏人熟谙汉文书法，并称在盛行西夏文的同时，汉字书法始终在西

① [俄] 孟列夫著，王克孝译：《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94 年，第 210 页。

② 卢桐：《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1986 年 4 期，第 73—79 页。

③ 卢桐：《论西夏文及其书法艺术》，《辽宁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1 年 4 期，第 28—30 页。

④ 韩小忙、李彤：《西夏时期的书法艺术》，《固原师专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1 年 1 期，第 55—56 页。

夏国内占有重要地位，如西夏距唐代不远，故其书法具有颜、欧、柳各体的神韵风采而妙得其法云云^①。相比之下，韩小忙等人的认识较为深入。他们认为：作为由以武立国的游牧民族党项族为主而建立的国家，西夏虽然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，认识到了汉族儒家文化在统治国家中的重要性，同时，也的确非常推崇和积极吸收汉文化的精髓，但其文化土壤毕竟贫瘠得多，所以书法在西夏并未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。加之西夏文字的使用以及民族习惯的冲击，客观上造成了本地区汉字书法艺术水平的低下^②。不过，这几种说法在微观考察方面都缺乏内在的连续性，特别是未能体现出汉文、西夏文书法在西夏数百年间的发展脉络，在本质上还停留在风格赏析阶段。后来的一些研究，虽然在字形分析或夏、汉比较基础上认识有所深化^③，却没有取得“质”的突破。而造成这一缺憾的根本原因，则是对连续性、阶段性重视不足。换句话说，“年代”意识不足，是制约早期西夏书法研究难以走向深入的关键因素。

苏联解体之后的“空挡”，为西夏文献在国内外渐次刊布提供了宝贵机遇。除推动“西夏学”的深入发展与持续繁荣外，更使西夏书法的“内涵”渐趋扩大，具有了“文化”比较层面的意义。例如，业内耆宿牛达生强调西夏文的创制借鉴了“汉字成法”，所以“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汉字的优秀书法传统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西夏文字书法作品”^④，而冯继红的博士学位论文《汉字文化圈西夏文、女书书法文化研究》，则从文字、文化等方面对西夏文书法进行了研究，认为西夏文及其书法受汉字文化影响甚深。冯文最值得注意之处，在于明确提出“书法”概念不应该局限于汉字的书写，其他文字，特别是与汉字有别但又有所关联的文字的书写，同样也是“书法”^⑤。之所以如此，与其导师张铁山教授的突厥语学术背景显然脱不了关系。当然，深入考虑的话，这样的认识无疑过于宏观和表面化，容易流于肤浅，并不足以承担深入探析西夏书法发展路径的重任。

二、“作品”的整理

西夏学曾经“最大”的问题是但凡见到西夏文文献，就不加思索地认定为西夏王朝的遗物，进而把伴生的无年款汉文或其他文字的文献，也认定为西夏时期的文物。即使在西夏学研究资料最为丰富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，其汉文部分除西夏时期的文献外，还包括唐、五代、辽、宋、

①卢桐：《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1986年4期，第74页。

②韩小忙、李彤：《西夏时期的书法艺术》，《固原师专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1年1期，第55—56页。

③柴建方：《古朴的石碑奇异的文字——“西夏碑”及西夏书法简评》，董恒宇主编：《全国首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37—244页；《中国书法》2005年第10期，第38—40页；毛来红：《略论西夏书法艺术》、刘魁一：《西夏文字书法创作浅谈》、窦民立：《简述西夏文字书法艺术》，分别载李范文主编：《西夏研究》第三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601—602、628、630—631页。

④牛达生：《汉字影响下的西夏书法艺术》，《寻根》2012年2期，第35页。

⑤冯继红：《汉字文化圈西夏文、女书书法文化研究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2年，第4—5页。



西夏、金、伪齐、元(含北元)诸朝的文献^①；西夏文部分虽不可能有唐、五代、辽、宋之物，元代甚至北元作品却极为常见。仅此一端，即可见这种做法的问题之大。当然，在资料公布不够充分的时候，类似错误尚可以谅解，而在俄藏、英藏、法藏、日藏黑水城或西夏文献已经渐次刊布几尽的今天，为最大程度上杜绝这种疏误，西夏学专业人士应该在“断代”方面更加严格，更加细致，也更加规范一些。具体到书法研究领域，既然西夏的书法“作品”不可能与西夏“文献”截然分开，以“史”为核心的西夏书法研究，就必须建立在严谨扎实的文献整理基础之上。

与延续 3000 余年的汉文书法类似，西夏书法“作品”也大致包括实物、文献著录两种存在形式。具体说来，前者有墨迹(抄本、文书、题记)、碑刻、印本、玺印、钱币铭文；后者多为见诸史籍，但大多已经亡佚的章表牒文。作为学术“对象”或艺术史“文本”，这些作品的特性，在总体上有其一致之处，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区别。因此，对它们的分析和利用，自然应该有所不同，即在顾及其特性的基础上，最大程度地挖掘其价值。析而言之，大体如下：

其一，作为最能体现西夏人“书写”真实细节的作品类型，墨迹主要包括抄本、文书、题记等类型。黑水城文献在拥有大量印本的同时，还兼有数量庞大、内涵丰富的西夏文文书、抄本，但正如前文所引，黑水城文献中的相当一部分，属于西夏之外的唐、五代、辽、宋、金、伪齐、元(含北元)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西夏时期的黑水城文献，也大多集中在仁孝时期或仁孝以后。至于壁画或礼佛“题记”，基本集中在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地，时间持续比较长。尽管这些墨迹在地域分布上并不均衡，难以满足整体研究的需要，其中年代信息明确者，仍然可以视为西夏“书法研究”的最基本，也最坚实的支撑点。

其二，碑刻方面，西夏碑刻主体的西夏王陵残碑尽管破损严重，发掘、清理、整理工作也存在诸多不足，导致年代信息不够确切，但截至 2004 年，其数量已不下 4000 余块^②，而且其建设与西夏的建立、兴盛、灭亡基本相始终，所以绝对不能忽视它们。更重要的是，古人为帝王、勋贵树碑立传时，规格、工艺乃至人员选择都必然会务求尽善尽美，虽然未必是当时的最高水平，但肯定符合官方对“典范”的要求。又如钱币铭文，同样不一定算得上西夏书法的最高水平，然而它时代特征明确，因流通、支付功能而成为沟通国家与社会、民众的媒介，所以也具有“完美”体现西夏人对书法的基本理解和基本要求的潜质。这意味着，研究西夏书法的整体演变源流，西夏陵残碑、西夏钱币铭文是当之无愧的最佳切入点。本着这一认知，笔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将相关陵墓碑刻系于下一任皇帝即位之初，钱币则系于相关年号之末。当然，年款明确或有充分证据支持者例外。

其三，所谓已经遗失的西夏书法作品，主要指出使宋、辽、金的使节携带的章表及地方官方

^①孙继民：《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》，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3期，第67页。

^②史金波、陈育宁主编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19册，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4—6页。

机构的往来牒文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这类作品几乎每年都有，而且数量较多，是西夏与周边政权官方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和媒介。即使制度并不周密完备之时，西夏方面也能熟练运用它。例如，《宋史》卷二八二《向敏中传》载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李继迁临终前“属其子德明必归宋”，且云：“一表不听则再请，虽累百表，不得请勿止也。”^①既然可以累累上表，足见当时西夏并不缺拟表、书表之人。宋仁宗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正月，已经于前一年十月登基称帝，并改元天授礼法延祚的元昊，终于遣使人宋。驼、马等贡物之外，呈表通报称帝消息才是此行的重中之重。据《宋史》卷四八五《夏国传上》，元昊呈表略云：

臣祖宗本出帝胄，当东晋之末运，创后魏之初基。远祖思恭，当唐季率兵拯难，受封赐姓。祖继迁，心知兵要，手握干符，大举义旗，悉降诸部。临河五郡，不旋踵而归；沿边七州，悉差肩而克。父德明，嗣奉世基，勉从朝命。真王之号，夙感于颁宣；尺土之封，显蒙于割裂。臣偶以狂斐，制小蕃文字，改大汉衣冠。衣冠既就，文字既行，礼乐既张，器用既备，吐蕃、塔塔、张掖、交河，莫不从伏。称王则不喜，朝帝则是从。輻辳屡期，山呼齐举，伏愿一垓之土地，建为万乘之邦家。于时再让靡遑，群情又迫，事不得已，显而行之。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，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，国称大夏，年号天授礼法延祚。伏望皇帝陛下，睿哲成人，宽慈及物，许以西郊之地，册为南面之君。敢竭愚庸，常敦欢好。鱼来雁往，任传邻国之音；地久天长，永镇边方之患。至诚沥恳，仰俟帝俞。谨遣弩涉俄疾、你斯闷、卧普令济、嵬崖妳奉表以闻。^②

此表首见《涑水记闻》卷一一，文字与《夏国传上》略同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三则有节文，而内容颇异，当是删削或异译所致。无论哪一个版本，均文采斐然，不卑不亢，把希望与宋平起平坐的心态表达得非常充分，也非常“理直气壮”。事后西夏使者返回，之所以坚决拒绝接受北宋的诏书，固然与元昊的叮嘱有关，而此表所显露的“信心”与“激励”，应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既然如此，它肯定出自元昊欣赏的高层文臣手笔；相应地，书法也理当出自元昊认可的官方书家之手。半个世纪后，西夏天祐民安五年（1094年）正月十五日树立的夏、汉合璧《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》，西夏文由“旌记典集令批”浑崑名遇书丹，汉文、篆额由“供写南北章表”张政思负责。所谓“旌记典集令批”“供写南北章表”，想必就是承担此类任务的官方书家，

①[元]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二八二《向敏中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9555页。

②[元]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四八五《夏国传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13995—13996页。



也就是“专门”人员。由此可见，正是因为“章表”这一媒介的存在，西夏方面很早就为专业人士设置了相应的官位，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职官体系当中。

更重要的是，交付宋、辽、金的章表既然是专人作品，其水平即使赶不上宋人，想必也不会差出很多，自然不宜“忽略”。不仅如此，那些与宋、辽、金边境机构的交涉文书，乃至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“写”出来的东西，其实都可以如是看待。

其四，因为长期湮没不彰，西夏书法作品的“特性”并不十分明晰，所以需要通过与相关作品，即对西夏书法有影响的前代或同期作品，以及西夏遗民书法的对比，多方面，多角度地彰显其特色，进而挖掘其艺术与文化内涵。例如，夏献宗乾定二年（1225年，当宋理宗宝庆元年，金哀宗正大二年，蒙古成吉思汗二十年）十一月，金、夏达成和议后，翰林学士赵秉文奉命出使西夏。虽然中途被召回，但其《平泉店逢夏使》诗称：“穹庐毳服异华风，马上相逢一笑同。赠我何劳绕朝策，贺兰千里已胸中。”^①可知在金夏边界，赵秉文曾见到西夏接伴使。其时间，据方亨《赵闲闲游草堂诗跋》，赵秉文于“正大乙酉季冬。奉使夏台回。游草堂。题诗七章。《咸阳怀古》二章。寺主义金刊诸贞石。用传不朽”^②。赵秉文是金代文宗，书法更为一时之冠，《金史》卷一一〇本传谓：“秉文之文长于辨析，极所欲言而止，不以绳墨自拘。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，律诗壮丽，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，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。字画则草书尤遒劲。朝使至自河、湟者，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，其为四方所重如此。”^③堪称西夏仰慕中原书法的力证。而且，既然西夏对赵秉文如此仰慕和了解，其书其文自然会受到他所代表的风气的濡染与熏陶。

三、“作品”的解析

与延续 3000 余年的汉文书法相比，西夏书法“作品”保存得极不完整，缺乏流传有绪的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“作品”。为从考古资料中选取相应的作品，亟需借鉴一些新的观念与方法，特别是“文本”和“图像学”方法。“文本”一词是英文 text 的对译，一般认为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；而在具体场合，则指根据一定的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而组成的，有待于读者阅读的整体语句或语句“系统”。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指出，文本具有用一定的符号表示的有头有尾的“外观”，同时又有内部结构^④。这种内、外兼备的特性，与考古资料，特别是“形式”特征明确而突出者，非常契合。这种特性，带来了两个结果，一是“文本”概念及相关方法在艺术史

① [金]赵秉文：《滏水集》卷九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90 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 182 页。

② [清]张金吾编纂：《金文最》卷四七，中华书局，1990 年，第 680 页。

③ [元]脱脱等：《金史》卷一一〇《赵秉文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，第 2428—2429 页。

④ [苏] IO. M. 洛特曼著，王坤译：《艺术文本的结构》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125—128 页。

研究领域非常方便，非常有效；二是考古资料在学术实践中常常被直接“转换”为艺术“文本”，而无须证明。当然，这种转换其实是有条件的，即所选择的“文本”必须足够丰富且足够典型。图像学（Iconology）方法主要立足于形式分析，重点探究作品为何如此表现，以及其深层含义，在现代视觉艺术研究方面应用广泛。近年来影响颇大的邱振中关于书法章法、图式的研究，在根本上其实有着很强的图像学色彩。如果能从西夏书法作品、相关作品这两大类及其相互关系入手，再根据它们的不同特性，采取有针对性的合理解析，应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“还原”西夏书法生成、发展的原初机制。

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19册著录的80件“西夏陵区采集汉文残碑”中，第6件为“M12：1972年4号陵西碑亭采集”^①，第7件为“M12：1974年4号陵西碑亭采集”^②，第32件为“P4：03 1997年4号陵西碑亭采集”^③。1972年编号M12的陵墓即后来的L4，但L4的资料尚未公布，“P4”也不见于其他公开材料，而且L2之西约500米处亦有M12^④。其间关系究竟如何，尚不清楚。这几件作品的风格内涵非常丰富，特别是1972年发现者之左促右展，姿态横生，明显出于苏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内容为“……之休，……/……孙兮，承此……/……铭竹素兮，遒……”（图1），隐隐然有“孙”赞“祖”之意，应该是“孙”辈帝王供奉“祖”辈帝王之物。若“祖”“孙”为实指，此碑应属凉祚陵前诸碑之一。类似的，还有西夏陵L6（原L8）^⑤陵台前盗坑底部出土经幢幢身1件，幢座3件。幢身高34，直径35，上下皆有柱状榫头，榫高7cm，8面，每面边长16cm。每面竖刻汉文，依次为“药王菩萨摩诃萨”“药上菩萨摩诃萨”“无边身菩萨摩诃萨”“越三界菩萨摩诃萨”“□□□菩萨摩诃萨”“□大菩萨摩诃萨”“观世音菩萨摩诃萨”“大势至菩萨摩诃萨”^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幢铭（图2）书风亦近苏轼。

据新近研究，西夏诸陵排列无所谓“次序规律”，其中L6属德明^⑦，L4或属继迁^⑧。德明、元昊时期，西夏书法尚“欧”，不应该有此书风；继迁时期书作尚未发现，但总不会预出苏风。稍晚到北宋中后期，苏书渐盛，甚至远播异域，至金初“借才异代”之际更是盛行于北方^⑨。因此，这些碑版显然是后世之作。北宋后期到宋、金之际，西夏的君主是秉常、乾顺。《辽史》卷

①史金波、陈育宁主编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19册，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39页。

②史金波、陈育宁主编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19册，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40页。

③史金波、陈育宁主编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19册，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43页。

④许成、杜玉冰：《西夏陵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8页图二、46页图二六。

⑤陈永彪：《西夏碑（石）刻述要》，《文博》2010年第5期，第23页。

⑥许成、杜玉冰：《西夏陵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99页；史金波、陈育宁主编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18册，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70—172页；杜建录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叙录》，《西夏学》第三辑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32页。

⑦孙昌盛：《西夏六号陵陵主考》，《西夏研究》2012年第3期，第27页。

⑧孙昌盛：《西夏六号陵陵主考》，《西夏研究》2012年第3期，第28—31页。

⑨曹宝麟：《中国书法史·宋辽金卷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86—390页。



图 1



图 2



图 3

二九《天祚帝纪三》载保大三年（1123年）“六月，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皇帝”，卷一一五《西夏外记》则谓：“保大二年，天祚播迁，乾顺率兵来援，为金师所败，乾顺请临其国。六月，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，而天祚被执归金矣。”^①辽保大三年是癸卯年，当夏崇宗元德五年，宋徽宗宣和五年，金太祖天辅七年，太宗天会元年。据《金史》卷二《太祖纪》、卷三《太宗纪》，是年四月，完颜宗望败辽天祚帝于“应州”，八月，阿骨打（1068—1123）卒。九月，弟吴乞买继立，是为金太宗。寻改金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。至次年正月，西夏“奉表称藩”。如此一来，《西夏外记》实误“三年”为“二年”。换言之，乾顺实于保大三年五月迎辽主于云中，天祚帝则投桃报李，册封乾顺为帝，给予对等地位，希望以此换取西夏的武力支持，共同抗御咄咄逼人的金军。

①[元]脱脱等：《辽史》卷二九《天祚帝纪三》、卷一一五《西夏外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347、1528—1529页。

对于天祚帝“借兵”的要求，乾顺没有草率行事，但对“皇帝”之位，他不可能毫不动心。不过，辽朝此时已风雨飘摇，仅仅得到其册封，根本不足以成为“真正”的皇帝，只有以武力为后盾，再通过相应的仪式昭示天下之后，才有可能获得最终“承认”。这种仪式，就包括对祖先的祝告与祭祀。《宋史》卷一〇七《礼志十·禘祫》：

宗庙之礼。每岁以四孟月及季冬，凡五享，朔望则上食、荐新。三年一祫，以孟冬；五年一禘，以孟夏，唯亲郊、封祀。又有朝享、告谢及新主祔谒，皆大祀也。二荐，则行一献礼。其祔祭，春祀司命及户，夏祀灶，季夏祀中溜，秋祀门及厉，冬祀行，惟腊享、禘祫则徧祀焉。^①

“禘祫”，指古代帝王祭祀始祖的一种隆重仪礼，在此指帝王向祖先谢恩。得到辽这样的大国认可为帝，既值得庆祝，也值得通告祖先。就此而言，这些苏风碑刻是乾顺被册封为“夏国皇帝”后，献祭于“太祖”继迁、“太宗”德明或“太宗”德明、“毅宗谅祚”的遗迹。具体到1972年在L4发现的苏风碑刻，从陵寝规模较小来看，属于谅祚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。遗憾的是，辽此时已近败亡，天祚帝不久又被金军俘获，“称帝”之事没有了下文。而100年后蒙古军队的野蛮破坏，又使我们难以勘破其详，只能费尽周折，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线索去推敲、探索。

玺印方面，西夏玺印以官印为主，私印很少，在宁夏、甘肃、陕西、内蒙古等历史上与西夏有关的地区外的青海、山西等地，也有出土或发现^②。这些官印皆为铜质方形，柱状榫钮，印文多系白文（阴文）九叠篆，有2字、4字、6字之别，但90%以上为2字的“首领”。印背多左刻年款，右刻姓名，间有易位者。钮顶刻西夏文“辘(上)”字，偶尔也有未刻或漏刻者。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已达150余方^③。无论数量，还是分布地域，已知均足以体现出一种官方认可的“规范”。对于有年款者，自然可以系入相应时代，而无款印章的时代或相对年代，则须斟酌推求。故宫博物院藏“眙逃藉藁(工监专印)”(《汇考》5,图3)，背无年款、名款，但上缘有汉文“上”^④，这一点非常特别，应该是立国初期相关制度尚不周密所致。考诸《宋史》卷四八五《夏国传上》，制成西夏文后，元昊“设十六司于兴州，以总庶务”^⑤，旋改元大庆，时当

①[元]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一〇七《礼志十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2579页。

②陈炳应：《新发现的西夏文物述论》，《西夏文化史论丛》（一）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127页；周群华：《介绍四川收藏的几方西夏官印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1987年6期，第85页。

③白滨：《西夏官印、钱币、铜牌考》，史金波、白滨、吴峰云编：《西夏文物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0页。

④陈炳应：《新发现的西夏文物述论》，《西夏文化史论丛》（一）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127页；周群华：《介绍四川收藏的几方西夏官印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1987年6期，第85页。白滨：《西夏官印、钱币、铜牌考》，史金波、白滨、吴峰云编：《西夏文物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0页。罗福颐辑、李范文释文：《西夏官印汇考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6—8页；史金波、陈育宁主编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20册，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63页。

⑤[元]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四八五《夏国传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13995页。



宋仁宗景祐四年(1037年)。立国以后,元昊大约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(1039年,宋仁宗宝元二年)定朝仪,各项制度渐具规模。可能就在此后不久,西夏逐渐颁诸司官印。就此而言,《汇考》5“工监专印”很可能做于称帝前后,是一枚早期西夏印章。

总之,若想深入研究西夏立国200余年间书法艺术的发展,首先必须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和掌握“作品”,其次要在“断代”基础上排比先后谱系。具体操作时,则必须重视和强调“作品”在时间、地域分布方面的均衡,再辅以科学“断代”,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出西夏书法的发展、演变轨迹。凡此种种,正是笔者不惮烦琐,按年代排比联系西夏一代的书法作品,并兼及其兴起、灭亡以后的一些相关事迹、遗迹,以期勾勒其演进脉络的根本原因。

(责任编辑:于光建)